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文史田野与俾斯麦时代

——德国文学、思想与政治的互动史研究

A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BISMARCK'S EPOCH:
A Study of Interactive History within German Litera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
叶
集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文史田野与俾斯麦时代

——德国文学、思想与政治的互动史研究

A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BISMARCK'S EPOCH:
A Study of Interactive History within German Litera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叶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田野与俾斯麦时代：德国文学、思想与政治的互动史研究 /
叶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267 - 8

I. ①文… II. ①叶… III. ①文学史—研究—德国—近代
IV. ①I516.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08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序

初次结识叶隽先生是在 2005 年。那年秋天，我遵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叶廷芳先生之嘱，在杭州举办了一次奥地利现代文学研讨会。那次会上，他做了个学术报告，话题是“史家意识与异国对象”。许多年过去了，我对报告内容的印象似乎早已淡去，但与他在西子湖畔的谈话却记忆犹新。

那年他刚三十出头，算是德语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青年才俊。从外表上看，叶隽温文尔雅，当年似乎略显青涩。而在言谈之中，他新锐犀利的学术思考和大胆的理论构想却让我暗中惊讶。记得我们的话题是“德国学”。观点大概是：德语文学研究如何才能走出狭隘的语言和文本空间，中国学者又该如何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纵、横两个维度来创新德语文学研究的范式，如何将西方语言文学研究纳入西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从而确定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性。当时我们似乎不谋而合，认为学科交叉整合、知识重构和中国学者的身份转变乃德语文学研究和德国学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当时，我已经在浙江大学创办了“德国学研究所”，从学科建设上对德国学进行探索，而他则在一些年之后写成了一部书，书名叫《德国学理论初探》。

2012 年 9 月，叶隽把一部《文史田野与俾斯麦时代——德国文学、思想与政治的互动史研究》文稿寄给我品读。读完之后我着实大吃一惊，我感叹他在学问上的进步，却没有料到他已经把“德国学”的理论构想和方法论上完成了一次探索实践。

叶隽的这部力作以全新的文学批评视野对德国崛起时代的文学与思想、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田野鸟瞰式的思考和研究。其主要涉指已不再仅为文学文本或者文学史本身，而是文学现象与文史哲语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德意志精神的产生与文学间的互动关系。这部专著涉及的领域广阔，作者思维活跃、天高鸟飞、海阔鱼跃，溯本逐源，从歌德—赫尔德—黑格尔的文学哲学轴线连接到马克思—拉萨尔—俾斯麦的政治轴线，从而

探索德意志精神源起对日耳曼民族崛起的本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瓦格纳与尼采的研究和拉萨尔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追问，还原了这些德意志历史人物的精神本质，从文化人类学的时代语境出发解读了文学社会学。

叶隽在实践“德国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似乎非常明白纲举目张的道理，在德意志的文史田野中，他抓住了思想史这一条红线，将哲学、历史、艺术、政治、文化等德意志精神现象用文学这一张大网将其一网打尽。具体地说，作者的理论思考均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从文学文本的阐释出发，但又超越了对文本的解读，或曰超越了文学研究中的文本主义痼疾，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以俾斯麦的《回忆与思考》、拉萨尔的《济金根》、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和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等为研究对象，集中聚焦日耳曼精神中特别是德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伦理价值观问题，形成了自歌德以来德意志问题的核心，即国家政治与精神文化间的依存关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隽作为中青年学者，在这部新作中采用了散文式的语言，一扫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的晦涩文风，置眼下外国文学研究界盛行的食洋不化的伪科学语言于不顾，用自由、飘逸、隽永的文字，用中华学术话语形式对“德意志精神与德国文学”这个重大文学史问题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这种中国式的学术话语还体现在他提出的“二元三维”的理论框架上，叶隽在这部新作中，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对当下学界对西方思维中普遍认可的保守—自由二元论观点提出颠覆性的质疑，提出了“认知—文化—政治”的三维互动的文学史观，这点在外国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史研究中显得颇有新意。

叶隽先生在这部新作即将付之梨枣之际，嘱我写序。诚惶诚恐之余，却又对德语文学研究界人才辈出而备感欣喜，故欣然从命。

是为序。

范捷平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德国学研究所所长）

目 录

序	范捷平(1)
---------	--------

第一章 绪论	(1)
一 德意志文化民族的政治兴起:日耳曼使命与铁血手段	(1)
二 1860—1890年:俾斯麦与德国崛起的工业化转型	(5)
三 文学、思想与政治史的互动:作为文史田野的现实主义 小说	(9)
四 理论框架与研究思路	(11)

上 篇

第二章 俾斯麦的教养形成与德意志精神的确立	(19)
一 俾斯麦的教育经历与教养形成 ——以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为中心	(19)
二 作为政治家的俾斯麦:在铁血手段与文化理想之间	(27)
三 德国社会的立体建构与德意志精神确立的“文化—政治” 结构	(33)

第三章 三雄纷争意若何? ——1860年代的马克思、拉萨尔与俾斯麦	(39)
一 民族国家建构 ——德意志视野中的俾斯麦功业及其比照者	(39)
二 在理想情怀与现实功利之间 ——拉萨尔的两难与骑墙	(41)

三 世界胸怀的体系重建

——德意志传统中的马克思理论 (47)

四 博弈语境与三雄纷争:谁是赢家? (51)

第四章 谁持赤练当空舞

——尼采之疯与俾斯麦去职 (56)

一 尼采的疯癫之路

——从反对瓦格纳说起 (58)

二 俾斯麦去职之途

——在瓦格纳、马克思之间 (68)

三 在巨人的阴影下

——威廉二世时代的浮现 (72)

中 篇

第五章 重构德国社会制度的大手笔

——以《思考与回忆》为中心 (81)

一 作为生平志业回顾的“回忆录” (81)

二 伟大时代的剧照下

——真实的政治博弈进程 (83)

三 作为德意志精神化身的俾斯麦及《思考与回忆》的文学史

和思想史价值 (85)

第六章 《济金根》所反映的时代语境与精英理想 (90)

一 作为理想人物的济金根—胡腾结构 (90)

二 济金根的革命者意识?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追问为中心 (95)

三 《济金根》的思想史与文学史意义

——兼论拉萨尔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选择 (99)

第七章 反现代的哲学总结

——以《苏鲁支语录》为中心 (104)

- 一 “超人”之横空出世
 - 东方哲语的西方底色 (104)
- 二 《苏鲁支语录》反映的浪漫思脉代表之尼采 (108)
- 三 作为体例范式的《苏鲁支语录》
 - 以人类命运的诗哲思考为中心 (114)

下 篇

第八章 “婚姻纽带”抑或“歧路之爱”

- 作为俾斯麦时代文史田野的《艾菲·布里斯特》及其反映的市民家庭价值观的变迁 (123)
- 一 艾菲是如何被教化的? (124)
- 二 殷士台顿其人及其教养形成 (130)
- 三 殷士台顿与俾斯麦时代政治高层的关联
 - 理解普鲁士官僚阶层个案背后的资产阶级因素 (133)
- 四 普鲁士的伦理观与俾斯麦时代的社会风俗
 - 以“婚姻纽带”为中心 (136)
- 五 “歧路之爱”?
 - 德国传统脉络中市民家庭的价值观追问 (141)

第九章 资本积累视阈中“国民性仆从意识”

- 《臣仆》与亨利希·曼的时代批判 (144)
- 一 资本主义的官场视角与仆从民族性的客观语境 (144)
- 二 仆从意识的国民性特征
 - 教育规训与秩序寻求:以狄德利希为中心 (148)
- 三 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必然?
 - 兼论传统的另类建构问题:以老布克为中心 (152)

第十章 文史世界里的俾斯麦时代

- 以《布登勃洛克一家》为中心 (157)
- 一 俾斯麦时代的商业景观
 - 以托马斯的经济活动为中心 (158)

二 资产阶级的新陈代谢	
——以哈根斯特雷姆为例	(162)
三 二元抗争的超越因素	
——以吕贝克望族布氏为例看资本主义德国的纵向背景	(165)
 第十一章 结论:从“浪漫—启蒙”思脉结构到	
“保守—自由”二元话语	
——德国文学史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史进路	(171)
一 思脉结构与思想话语	(171)
二 “保守—自由”二元话语	(176)
三 德国文学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史进路:追问德意志精神	(182)
 主要参考文献	(191)
西文—中文名词对照表·索引	(202)
后记	(212)

第一章

绪 论

一 德意志文化民族的政治兴起： 日耳曼使命与铁血手段

虽然自 18 世纪起，德意志文化民族的呼声就一浪高于一浪，历来的精英人物都焦切地关注着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将一种文化民族的建构视为本民族的头等大事。这一点，到了黑格尔处，则标立为日耳曼民族的天纵使命，由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的梯形链条终于落到了自家头上^①。这点似乎日后成为了一种民族范式，不但为俄罗斯所沿用，更被日本所吸纳，这两个民族日后在中国战场上所爆发的“日俄战争”，与其说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霸权或抢占殖民地的战争，还不如认为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作为西方文化格局中的异者，俄国人乃是尴尬的“中间人”，可在亚洲民族看来，“老毛子”无论如何属于西方人的行列；而作为东方文化中的异者，日本人当初虽然同样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但他们迅速改弦易辙，汲取西方先进知识和技术，所以能够“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②。如果说俄国人当初为了是“斯拉夫化”还是“西化”而有着喋喋不休的争吵和困惑，那么日本人后来的“脱亚入欧”几乎是众口一词，没有太多的争议；但现在他们似乎又有些焦急地调整步伐要“重返亚洲”了。可不知道黑格尔在设计这一套

① 所谓“‘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6 页。

② 鲁军：《清末西学输入及其历史教训》，载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 2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2—123 页。

理念的时候，是否会想到必须以铁和血的手段，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国家自由？当初他略带调侃而又不乏敬重地描绘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之时，他是否真的认为只要占据“思维中的世界精神”的优势地位就可以真的君临世界？但历史的真实却是，只有当俾斯麦以“铁血”手段去面对欧洲的时候，德意志民族才真的实现了多少代精英梦寐以求的统一理想。

从1822年黑格尔开始提出“世界历史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的命题，到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的镜厅举行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的加冕仪式，仅仅用了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作为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黑格尔，真不愧是勇气可嘉的大哲人，他的预言不仅在精神观念层面上鼓励引导了德国人，而且最终也在政治实践的层面获得了印证和胜利。在19世纪德国政治史上，有两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即1813年与1870年，解放战争与统一战争，有论者认为这两者分别是热情与谋划的产物^①。两战皆针对法国，不过前者是为自由而战的反抗侵略者，后者则是为权力而战的帝国策略。这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无论如何，在拿破仑铁蹄蹂躏之下的任何民族，都有奋起反抗之权利，其正义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后者则不然，在俾斯麦为了实现德意志统一的精心谋划之中，三次王朝战争说到底所为都是利益，说得更严重些就是不义之战。即便俾斯麦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便德意志文化民族的政治实现是一件伟大的事件，即便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但我们毋庸为尊者讳的基本判断就是，从黑格尔到俾斯麦，并非一条漫长的道路，其中有清晰的轨迹可循。

而从弗里德里希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到俾斯麦，有一种内在的政治史脉动。在我看来，德意志精神人物在这里达到了一种有趣的张力协调。可流亡美国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Ludwig, Emil, 1881—1948）则特别凸显了德国精神文化与政治的脱节现象：“我从二十岁开始，就在不少的戏剧和传记中描写德国人的性格，从乌尔利希·冯·胡登，格林瓦尔德到歌德，贝多芬，韦伯，瓦格纳，以及从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威廉，兴登堡，我对德国思想精神界人物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很反感。德国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

^① [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与政治的脱节现象，使得德国的历史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当这个国家强盛的时候，其思想精神总是遭到涂炭，反之，思想精神就得到发扬。”^① 按照他的思路，对于德国来说，精神文化与国家繁荣是矛盾的，甚至精神文化与世俗政治权力是完全脱节的。他特别张扬了精神文化的作用，认为其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头脑，是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指引和指向：“对于世界来说，即使把所有的德国皇帝和首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莫扎特和舒伯特，比不上丢勒和科隆大教堂；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她的艺术、绘画相媲美。”^② 他的论断当然很能引人注目，但果真完全如此吗？从个体心性上来说，虽然我也非常同意对文化史人物的高度评价，但按照文明结构的整体性观念来看，我们还是更应关注文化、制度、器物三个层面的协调性，所以我还是试图另外梳理出一条线索，即从歌德、席勒到威廉一世、俾斯麦的道路，就一个纵向的德国史演进轨迹而言，如果说这似乎有些错位、错轨的感觉，但我要说的是，它事实上确实存在，只不过要弄清楚其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必须再做一下搭建桥梁的工作。

当然，我无意重复卢卡奇与梅尼克之间的论争，究竟是理性的毁灭，还是偶然间误入歧途，这是一个不用置辩的问题。按照侨易学的观念，二元三维是一个基本结构，在文明史结构中亦同，不考虑到制度是由上层观念、下层器物相互作用的产物，以及三维互动的基本结构特征，是很难观察事物全相的。

我们应该关注到一个现象，这就是“集团效用”的概念被揭出，有论者认为这一概念的意义就是“要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要把极少数人手中的文化传播开来，要把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社会建立起来，因此为了集团效用的利益，要求个人放弃自己”。不仅如此，集团效用还可以“从最重要的时代现象中到处可以发现”，诸如俾斯麦的组织、拉萨尔的鼓动、毛奇的战术、瓦格纳的音乐、文学家的活动等，都是“以对集团效用的信仰为基础的”^③。从事实上来看，此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聚沙成塔的方式，社会运动才成为可能。这或许也正是卡内蒂（Canetti, Elias,

① [德] 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具有双重历史的国家》，杨成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丹]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905—1994)为什么要强调《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的原因了,按照他的说法:“群众需要导向”^①,而显然,这些伟人的策略方式,都很善于“运动群众”!但我在这里还是希望聚焦于精英,因为只有扭住精英,这些在任何时代中都能聚集群众、引导群众的人物,我们才可能理解社会运动的整体方式。但精英不是一个简单的单数,我们必须将其区分类型,放置在结构体的不同位置,才能更好地把握他们的位置和功用。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路径演进:歌德、席勒、费希特、黑格尔、施莱格尔兄弟/弗里德里希大帝/罗斯柴尔德的立体结构,是通向瓦格纳、尼采/俾斯麦、威廉二世/克虏伯、西门子的必然过程。如此说法,是想强调,即由歌德、席勒而来,尤其是启蒙思脉路径发展而至的德国思脉路径,是如何经由文化—政治—经济这种立体文明结构的相互关联性,而最终导致了日后的发展路向的,尤其是罗森堡(Rosenberg, Alfred, 1893—1946)/希特勒/克虏伯(Krupp, Alfred, 1906—1967)结构的出现。而且即便是在每一个层次结构中,也有其复杂的路径纠葛,这种路径相异性,在不同结构层面也都是得到印证的。而联结起这种不同层面关联的人物,赫尔德(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他对文学极为重视,要求写一部能够清晰地描绘文学发展整体图像的著作。在他看来,“语言的天才必将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天才”。刚过弱冠之年的赫尔德显然将文学与其思想中的致用思路紧密联系了起来,他始终在德国的总体背景下来考量文学的使命:“我们在德国工作便如同建造巴别塔时一样艰难,不同趣味的流派、诗艺上的各种派分、思想上的诸多学派彼此论争激烈;既没有首都,也没有共同利益;既没有共享的伟大承担者,也没有共享的制订法则的天才。”^②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发展出的文化

① 具体言之,“为了群众的继续存在,导向不可缺少。群众一直担心会瓦解,这使得有可能把它导向任何目标。只要群众还没有达到的目标,群众就继续存在着。但是,在群众中还有着导致更有意义的新生成物的若明若暗的运动趋向。”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卡内提即卡内蒂。

② 德文为:Wir arbeiten in Deutschland wie in jener Verwirrung Babels; Sekten im Geschmack, Parteien in der Dichtkunst, Schulen in der Weltweisheit streiten gegeneinander; keine Hauptstadt und kein allgemeines Interesse; kein grosser allgemeiner Befoerderer und allgemeines gesetzgeberisches Genie. “Ue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 in Nationales Forschungs- und Gedenkstätte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Literatur in Weimar (hrsg.): *Herders Werke in Fünf Bänden* 《五卷本赫尔德著作集》. 2. Band. Berlin & Weimar: Aufbau-Verlag, 1978, S. 9. 笔者自译。

民族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伯林（Berlin, Isaiah, 1909—1997）有关赫尔德的两段话似颇为矛盾，他一方面说：“赫尔德绝不主张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侵略和培植民族自豪感，他痛恨这些东西。”^① 另一方面又说：“赫尔德是受着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压迫的各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伟大倡导者，最后也成了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各地的直接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伟大倡导者。”^② 实际上，伯林已经意识到了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或许还应添上经济民族主义，都是无法完全割裂，甚至密切关联的，因为我们身处其中的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三位一体结构，舍却任何一端都会在空中使自己成为精神跛足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俾斯麦定位为政治民族主义者的话，显然也并不完全，在政治层面施展铁血手段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日耳曼使命”的实现，黑格尔的定义其实早就提供了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纽带。不过，其实更值得关心的，恐怕还是“文化下延”的重要性，就是在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器物层面是如何发生经济民族主义的？

二 1860—1890 年：俾斯麦与德国崛起的工业化转型

从 1861 年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到 1890 年因与威廉二世不和而辞职，俾斯麦不但通过铁血手段赢得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更通过立法手段奠定了德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基础。作为政治领域的民族精神，俾斯麦对德国的意义可与拿破仑相媲美。可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础，没有经济上的保障，就不可能有顺利前进的物质性基础。

要知道，“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可以说是建立在一个由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和经营耕作的强大的大地主所组成的国家之内的。虽然在这儿或那儿不免有些例外，有些界限模糊。在它的整个历史中，在各个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势力对比上，或是在他们的人数分配上，都没有重大的变动，虽然

^① [伊朗]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3 页。

^② 《反启蒙运动》，载 [英]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 页。

在十九世纪末，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很小的趋势，即最大的和最小的两种保有地都在减少”^①。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来说非常重要，这说明农业在德国的经济构成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根本角色的，而且其结构的稳定性对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平衡意义重大。

必须指出的是，俾斯麦之所以能标立青史，尤其是成就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俾斯麦时代，所依靠的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上的保守主义或者简单的军事的“铁血手段”，其本质仍在于正是在“俾斯麦领导下，德国在整体规模上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为了工业国”^②。这种从经济史层面去考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形成史无疑是独具慧眼的，因为说到底，战争也好，社会生活也罢，都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舍此则无从谈起。俾斯麦的工业国建设是高屋建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德国如虎添翼，不但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增长迅速，而且在电气、化学等革命性的新兴工业部门也大力发展，这使得德国不但确立了工业强权地位，而且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真正的领袖国家”^③。对于德国这样一个长期形成的以农立国的农业国来说，完成这样一种转型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对于这样的大时代（如果不是伟大的话），当然需要文化层面的反映，而文学作为时代的速记师，自然难辞这样的功能。都说19世纪德国文学乏善可陈，事实上，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并不寂寞，它不但拥有如尼采这样了不起的哲人，更有冯塔纳这样的历史诗人。为俾斯麦时代认真书写下历史记录的，正是这样一位普鲁士的前官僚、日后的小说大家冯塔纳，他通过自己小说世界的建构，书写了第二帝国极为丰满的全景图。所以，其作品特别适合我们取来作为研究那个大时代的文学田野，因为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艺术勾勒，我们获得了足够的社会信息与观察视角^④；更重要的还是，

① [英] 克拉潘 (Clapham, J. H.): 《1815—1914 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傅梦弼译,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第 228 页。

② Haffner, Sebastian: Von Bismarck zu Hitler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München: Kindler Verlag, 1987. S. 90.

③ 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64 页。关于对德国的工业革命的详细论述, 可参见 Kieseewetter, Hubert: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1815—1914 年间德国的工业革命》). Frankfurt am Main, 1989.

④ 关于冯塔纳作品的评论与研究, 可参见 Aust, H. (Hg.): Fontane aus heutiger Sicht—Analysen und Interpretationen seines Werkes (《当代视角中的冯塔纳——作品分析与评论》). Muenchen, 1980.

这样一个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必然要在政治、制度、观念、文化等方面刻下深深的烙印。而任何一个伟大诗人都不可能只局限于艺术本身的空间营构，背向生的社会，指向思的世界，只是一个迟早的过程，在冯塔纳等人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也可借助诗人的内心之思获得反观理解俾斯麦时代的特殊路径。对于俾斯麦时代，梅内克（Meinecke, Friedrich, 1863—195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痛定思痛但却并不“数典忘祖”的总结或许有相当的代表性：

俾斯麦帝国的建立始终是一桩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就我们这一代和它一起成长并为它而献身的人来说，它那令人鼓舞的忠诚，对于我们始终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品。然而我们今天必须承认，过去在这种成就的光辉之下，我们对于隐蔽着的黑暗面注意得太少了，而这里正是他致命的弱点，后来疫病也就是在这里得以慢慢侵入的。它给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并从而也就给了普鲁士骄傲自满的那种危险的精神状态以太多的活动余地；这种活动余地又在帝国的领袖们和资产阶级中间创造了和培养了他们那种精神状态。^①

作为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梅内克的省思值得我们深思，也就是应当关注事物的两面性，任何一个伟大事物之下也都埋藏着巨大的阴霾^②。其实，这一点我们如果结合其时的大历史语境则可以看得更清楚：“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是1848年后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依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任意发展的道路上，那些

① [德] 梅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3页。

② 值得推进的一个思路是：反之，任何仿佛巨大的罪恶之下是否也有可能存在着某种人性的光辉呢？这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问题，但却并非不值得提问。